

30 三十年集



一份执著，一份眷恋；一种信念，一种姿态

燕园学文录



Thirty Years

复旦大学出版社
www.fudanpress.com.cn

夏晓虹◎著





Thirty Years

燕园学文录

夏晓虹◎著

復旦大學出版社
www.fudanpress.com.cn



自序

夏晓如

编这本集子给了我重温三十年生命历程的机会。

1978年3月,作为受惠于“扩大招生”的一员,我比大多数同班同学晚了一个月才走进北大的校门。没想到,由此开始的与北大中文系的缘分竟绵延了三十多年,直到如今。

入学前,我像很多77、78级的同窗一样,并没有接受过完整的中学教育。虽然我们这一级不再称为“工农兵学员”,但除了未当过兵,吉林插队七年、北京工厂一年半的履历,已足够让我与“工农”沾上边。这样的人生经历也使我的就读文科变得无可选择:只学过一年初中数学,理化课程完全空白,我自然不会存非分之想。不过,在这看似无奈的接受中,已有的社会阅历却成为学习人文学难得的凭借与底蕴。

大学毕业前夕,假如不是因为担心被分配做中学老师,我很可能已经承继父业,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干上编辑一行。按照当年的分配方案,我应该去该社的《当代》杂志,和在诗歌散文组的父亲成为同事。而此“一念之差”,让我又一次无可选择地报考了研究生,并得以投入季镇淮先生门下,收敛起大学时代对唐诗的兴趣,转向那时对我来说还相当陌生的近代文学。从此,近代、尤其是晚清也让我倾注了最多心力,它对于我的意义已不只是研究对象,同时也内化为一种眼光与态度。无论走到哪里,“晚清”都会超越时空,介入我所在的当下。

研究生学业终了,何去何从的问题再一次出现。自认为不适合做教师的我,仍然本能地希望逃避。填写分配意向时,我问季先生:“是把去文研所放在前面,还是留校作为第一志愿?”季先生并不理会我在问话中暗藏的排序,十分肯定地说:“当然先填留校。”我又是无可选择地服从了导师的要求,北大任教的生涯就此开始。而二十六年过去,教学相长,逐渐成熟的不仅是学生,也包括我自己。讲授专业课的压力,驱使我无法止步,必须不断开拓研究领域,探讨新的课题。

如今回想,我之所以能一路走来,有尺寸之进,最根本的原因是入读北大,并

且自此没有离开燕园。我的无可选择,其实也正不必选择。

我很庆幸,在我读本科的时候,北大的老师们由于“文革”十年的压抑,未能在讲台施展才华,遇到我们这些求知若渴的学子,于是每常小叩大鸣,倾心指授。作业发还,不但可见多处批点与评语,而且不乏字斟句酌的文辞修订。但凡论述中有一点可取之处,老师们都是揄扬鼓励,毫不吝惜;即使意见不同,既坦率批评,也不强求接受。那真是一段其乐融融的求学经验。也正是由于有这样的老师指引与提携,我才能够漫漫学术之路上起步。

我也很庆幸,在我读研究生阶段,导师为季镇淮先生,他把我领进了近代文学研究之门。相对于辉煌的古代文学与热闹的现代文学,时当1982年,夹在中间的近代文学还是一块灰暗、冷落的地带。季先生却以他高远的文学史眼光,认定此中大有可为,率先在此方向招生。我也得以追随先生,较早地踏足这块未经大力开垦的沃土,并与我喜欢的梁启超其人其文相遇。可以肯定地说,日后我所以在近代领域流连不去,其发端尽在季先生的宽容与赏识。

从梁启超研究出发,晚清向我展开了更生动的面容与更丰厚的蕴藏。由此开掘出的晚清女性生活、晚清启蒙教育等新话题,虽然似乎已游离我的本业“中国文学”,但在我看来,这恰是精彩纷呈的“近代文学”题中应有之义。而晚清文学的价值,已越来越得到学界体认,“附庸”正在“蔚为大国”。在这个意义上,我个人的研究也可以作为这门学科逐渐成熟的一个印证。

为了编辑这个选本,按照整套“三十年集”丛书的体例要求,需要在每年的选文前写一段“纪事”。我不能完全信赖记忆,还得借助历年存留的文稿与所记的流水账,尽可能准确地还原现场。这次翻检让我有时间仔细地回溯往昔,许多感慨与感动油然而生。在一个不高的起点上,能够走到今天,我觉得自己很不容易。而重新触摸那些发黄的纸页,温习当日老师的教诲;在一张草稿的背面,无意中发现刚刚毕业的我第一次授课的记录——《人民日报新闻研究班现代文学讲座计划表》,我这位不久前的学生名字,竟然与我所尊敬的季镇淮、沈天佑、孙静、严家炎、孙玉石等老师们排列在一起:其中明白显示出的是,在学术之路上,老师们对我一贯的呵护与扶助。

集中收录的三十年中的三十篇文章,从1980年的课程作业《谈谈李白的“好神仙”与从政的关系》改写而成的第一篇稍微像样的论文,到2009年为所编《清华同学与学术薪传》一书撰写的《缘起》,都是写于北大,可视为我的问学经历的一份

记录,故名之为《燕园学文录》。

编选此集,最初的想法是全部选论文,但篇幅不容许。现在兼收随笔,倒也可以比较全面地呈现我的写作状态。多数文章是据刊物或报纸所录,与日后入集者文字有不同。选择初刊的原因,一是为了减少字数,二是为了保留一份相异的文本。如果有读者需要注释周详、细节更多的全本,则本书附载的发表目录已提供所有出处。

2010年11月22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目 录

自序 / 1

一九八〇

谈谈李白的“好神仙”与从政的关系 / 2

一九八一

谈杜牧与李商隐的咏史诗 / 14

一九八二

杜甫律诗语序研究 / 23

一九八三

古代民歌表现手法对早期诗人创作的影响 / 32

一九八四

梁启超的“文界革命”论与“新文体” / 44

一九八五

五四白话文学的历史渊源 / 47

一九八六

怀此贞秀姿 卓为霜下杰——析陶渊明《和郭主簿》其二 / 63

一九八七

梁启超与日本明治小说 / 66

一九八八

写给别人还是写给自己——读几部近代人物日记 / 81

一九八九

说谭嗣同的“任侠” / 86

一九九〇

人生得意须尽欢 / 91

一九九一

晚清文学改良运动 / 97

一九九二

“明末三大家”的由来 / 118

一九九三

追寻历史的踪迹(关西篇) / 122

一九九四

发乎情,止乎礼义——林纾的妇女观 / 128

一九九五

从男女平等到女权意识——晚清的妇女思潮 / 148

一九九六

批茶女士是谁?——晚清翻译文学误读之一例 / 161

一九九七

在美国“发现”历史(录二) / 172

一九九八

晚清报纸的魅力 / 178

一九九九

刘崇佑:抗辩政府的大律师 / 182

二〇〇〇

心关国粹谋兴学——丘逢甲教育理念的展开 / 190

二〇〇一

晚清上海赛马轶话 / 209

二〇〇二

同里：曾经有过的荣光 / 218

二〇〇三

重构晚清图景——《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导言 / 232

二〇〇四

梁启超的文类概念辨析 / 237

二〇〇五

《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新版序 / 260

二〇〇六

晚清外交官廖恩焘的戏曲创作 / 264

二〇〇七

晚清的西餐食谱及其文化意涵 / 287

二〇〇八

从新发现手稿看梁启超为出洋五大臣做枪手真相 / 302

二〇〇九

温厚情谊 薪火相传——《清华同学与学术薪传》缘起 / 312

附录一：主要著作及论文发表目录 / 318

附录二：随境自在展风华——夏晓虹教授专访(蔡祝青) / 329

一九八〇

纪事

大学三年级，专题选修课多起来。我们77级是春季入学，故学年与阴历年的起始几乎相当。上半年我选了陈贻焮老师的“三李研究”与林庚先生的“楚辞研究”，乐黛云老师的“茅盾研究”虽然去听，却未交作业；下学期选了彭兰先生的“高岑诗研究”、吴小如先生的“唐宋词选讲”以及孙玉石老师的“中国新诗流派”。多年后，我交给孙老师的那篇短文，赏析象征派诗人李金发的诗作《记取我们简单的故事》，还被精心保留着，收入他主撰的《中国现代诗导读》（1917—1938），让我感受到先生对学生的真诚尊重。

而其中最早完成、并得到了老师鼓励的是“三李”课的作业。日后，我曾经写过《我眼中的“性灵派”学者——纪念陈贻焮先生》，追忆当初亲承教泽的经历，现节录如下：

若论对三家的分析，李贺、李商隐原无法与李白对垒，陈先生无疑更倾心于“谪仙人”的风采。而我从此课中最大的收益，是窥见了先生的治学法门。那确是一次有意为之的经验传习演示课。陈先生以其成名作《唐代某些知识分子隐逸求仙的政治目的》（收入《唐诗论丛》）为李白研究的基本文本，并抄录、油印了该文所涉及的相关史料，将写作缘起、资料准备、文章组织、结论产生的过程逐一详细道来，金针度人，对于我们这些尚未进入研究领域的学子，实有指点迷津之效。

课程讲授过半，同学们已陆续交上作业。陈贻焮先生也以其提携后辈的一贯热忱，当堂表扬其间稍可入目者。我的读书报告选择了《谈谈李白的“好神仙”与从政的关系》一题，在陈先生上文所论李白在朝中的表现基础上，又着重补写了入朝前与赐金放还后两部分内容，居然得先生青目相加。作业发下，几乎每页都可看到先生作为赞赏标记在左侧行端划下的钩，甚至一页中会连续出现几个表示特别欣赏的双钩，让我兴奋不已。末页空白处，陈先生还认真地写了如下评语：

对有关问题的材料掌握较全面，理解得较正确。越到后面创见越多，我看了很高兴。文章前半说明你学得好学得活，文章后半说

明你有独立进行科研的能力和基础。浓缩前半,更深一步加强后半,便可写成一篇有质量的论文。

落款日期是1980年6月26日,而我的文章完稿于6月15日,又非立时交出,陈先生应该是以最快速度审读拙文的,这也使我心生感激。不消说,陈先生的大作已为我提供了基本思路,可以借力不少,因而,此文的写成一半应归功于先生本人。况且,这是我第一次涉笔论文,学识的浅陋,行文的稚嫩,自知会贻笑大方。先生的赞誉我只当作鼓励,但其中感性化的词语确令我感动,并对从事学术研究开始具有几分信心。

谈谈李白的“好神仙”与从政的关系

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千百年来是以“谪仙人”的形象为人们所熟知的。他的诗歌风格清丽、飘逸,“言出天地外,思出鬼神表,读之则神驰八极,测之则心怀四溟,磊磊落落,真非世间语”(皮日休《刘枣强碑文》),故后世称他为“诗仙”。李白又尝自称“酒仙翁”(《金陵与诸贤送权十一序》),民间因此产生了李太白醉捉水中月的传说。后世更有人把他升入《广列仙传》中,成了一位名副其实的神仙。这一切造成了李白在人们心目中的神奇印象,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李白也是位曾经被神化了的人物。这种情况一方面表现了后人对他的崇敬与纪念,另一方面也说明李白诗歌中的确有可以使传说和附会寻到根据之处。

李白一生确实写了大量的游仙诗,即以《古风五十九首》为例,游仙诗就占了约十分之二,有将近十首之多。在这些诗中,他描述了奇异的神仙生活:“朝弄紫泥海,夕披丹霞裳。挥手折若木,拂此西日光。云卧游八极,玉颜已千霜。飘飘入无倪,稽首祈上皇。”(《古风五十九首》其四十一)心中充满了羡慕之情。他表示自己“愿餐金光草,寿与天齐倾”(《古风五十九首》其七),好像又很相信天地间真有长生不死之人。在《赠嵩山焦炼师》一诗中,他发愿说:“紫书倘可传,铭骨誓相学。”决心何等之大。更在《草创大还赠柳官迪》诗中一本正经地说:“抑予是何者?身在方士格。”竟然自视为道徒、术士一流人。但从李白的诗中还可以看到另

外一些诗句,表现了他对神仙说的怀疑态度。“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梦游天姥吟留别》)仙境既是梦想求仙的人永远不可能达到的,所以它在诗人的眼中又失去了魅力:“六鳌骨已霜,三山流安在?扶桑半摧折,白日沉光彩。银台金阙如梦中,秦皇汉武空相待。精卫费木石,鼋鼍无所凭。”(《登高丘而望远海》)在《月下独酌》中他更宣称:“贤圣既已饮,何必求神仙。”(《月下独酌》其二)只要有酒喝,神仙也不值得羡慕,而“蟹螯即金液,糟丘是蓬莱”(《月下独酌》其四)之句至少表现了他对神仙的不恭。最能集中反映他的自然观的是《日出入行》:“日出东方隈,似从地底来。历天又入海,六龙所舍安在哉!其始与终古不息,人非元气,安得与之久徘徊。草不谢荣于春风,木不怨落于秋天。谁挥鞭策驱四运,万物兴歇皆自然。羲和,羲和,汝奚汨没于荒淫之波?鲁阳何德,驻景挥戈。逆道违天,矫诬实多。吾将囊括大块,浩然与溟滓同科。”诗的最后两句虽然表现了道家“万物与我为一”的思想,表示要顺应自然、与自然相融,有消极的一面,但整首诗还是表现出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如果说前面所引的诗还只表示了他对神仙之事的怀疑或戏谑,这里则是彻底、明白地写出了他对道教最热心宣传的羽化登仙、长生不死说的否定。这种怀疑与否定的态度与热心求仙访道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同时并存于李白的思想中,是令人大为诧异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如果不是愚蠢,一定是有深意的了。这似乎是唯一可能的解释。宋人严羽在评李诗时,特意说过这样精辟的话:“观太白诗者,要识真太白处。……学者于每篇中,要识其安身立命处可也。”(《沧浪诗话》)这里,用简单的算术方法计算游仙诗的多少,从而于量中得出质的结论,是无济于事的。因此,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在“好神仙”的背后,李白有些怎样真实的用心。

李白的“好神仙”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入朝前、在朝中和赐金放还后。每一阶段的情况都有所不同。

由于道教在唐代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李白欲成就出将入相、建功立业的抱负,也选择了由隐入仕的道路。他采取求仙访道、交游干谒的办法,双管齐下,终于得到了被聘入朝的名道士及朝中有势力者的援引,“一鸣惊人,一飞冲天”(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于天宝元年(742年)应诏供奉翰林(详陈贻焮先生所著《唐诗论丛·唐代某些知识分子隐逸求仙的政治目的》)。

依靠道教势力的帮助,李白终于到了好神仙的玄宗身边。本来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很有意思的是,李白却并不赞成皇帝求仙。同样有趣的是,与他同时

入朝待诏翰林的道士吴筠也持此看法。《旧唐书·隐逸传》记载：玄宗向吴筠“问神仙修炼之事，对曰：‘此野人之事，当以岁月功行求之，非人主之所宜适意。’”这一方面因为仙不可致，轻谈此事会招来杀身之祸；另一方面也说明这些道士学道本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但看在朝中“筠之所陈，但名教世务而已。间之以讽咏，以达其诚”，就可知他的目的也是以道干政。李白比起吴筠，为道的资格更浅，所以皇帝绝不会向他请教登仙之术，他也不能像吴筠那样正面规劝，而只能旁敲侧击、隐喻讽谏。他的现存诗中所有写到帝王好神仙的诗，无一不带着批判的色彩，并且都是以秦始皇、汉武帝这两位求长生最狂热的前代君王为喻，针砭的作用是很清楚的了。《古风五十九首》中有两首是专写秦始皇的。其三的前半首诗称赞了秦始皇统一天下的功绩：“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但在后半段写到秦始皇派徐市带童男女入海寻蓬莱仙岛时，语气则显然不同了：“尚采不死药，茫然使心哀。连弩射海鱼，长鲸正崔嵬。额鼻象五岳，扬波喷云雷。髻鬣蔽青天，何由睹蓬莱。徐市载秦女，楼船几时回。但见三泉下，金棺葬寒灰。”他极意描绘了海上大鱼这个仙凡之路上不可逾越的障碍，所射“长鲸”越“崔嵬”，求长生者在“金棺”中剩下的一把“寒灰”就越可怜。“明断自天启”的秦始皇也竟然沉溺在神仙梦中，不能不使李白感到为之“心哀”了。另一首诗是这样写的：“秦皇按宝剑，赫怒震威神。逐日巡海右，驱石架沧津。征卒空九寓，作桥伤万人。但求蓬岛药，岂思农廩春。力尽功不赡，千载为悲辛。”（《古风五十九首》其四十八）诗人对秦始皇的狂妄之举予以严厉的谴责，特别指斥他造成了劳民伤财、耗尽国力的恶劣后果。“但求蓬岛药，岂思农廩春”集中表达了诗人的愤怒。他认为求仙与安民在帝王行来是不可兼得的，因为他们集权力和财富于一身，一举一动都与天下的安危治乱相关，无节制地求仙不仅无所得，反而必然有所失，会危害民生。而皇帝作为万民的统治者，最重要的事情是使百姓们安居乐业。何况李白是以“安黎元”为大志的，隐逸求仙主要是他为达此目的而采取的一种手段，所以他在诗中对人民的疾苦深表同情。可以这样说，李白对君王们好神仙不以为然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因此，他与吴筠的态度一致也就很自然了。同样题材的诗还有《古风五十九首》其四十三、《登高丘而望远海》、《上之回》等，都运用了同一的借古讽今手法，“景公一何愚，牛山泪相续”（《古风五十九首》其二十三）的诗句更直接道明了帝王们的贪图享乐、梦想长生的愚蠢。元人萧士赉认为，《上之回》“诗言秦皇、汉武之幸回中者，不过溺志于神仙之事而已，岂为求贤哉！时明皇亦好神仙，其讽谏之作欤？”（《分类补注李

太白诗》卷四)正是看出了李白的用心所在。

李白得到了接近皇帝的机会,本可以大展其“拯物”、“解世纷”的平生抱负,但他提出了什么政治主张,史书上并无记载,只在李阳冰的《草堂集序》中提到李白“出入翰林中,问以国政,潜草诏诰,人无知者”,具体情况已不得而知。至今流传最多的是《宫中行乐词》一类的应制诗。这种现象说明,玄宗把李白这般人请入朝,并非真要他们有作为、真允许他们干政,而只是把他们当成太平盛世的点缀品,用来表示“野无遗贤”罢了。所以李白在朝中的实际地位,不过是以诗赋供奉、娱乐皇帝的文学侍臣,这当然不能使他满意。长安三年也使李白看到了宫廷中的许多丑恶现象,从他根据这一段生活写的一些诗可以看出,他对当时的朝政是有较清醒的认识的。仅举《古风五十九首》中的几首为例:其二以月蚀喻玄宗宫中后、妃之间的倾轧;其十八描写了权贵们的骄横与奢侈;其二十四讽刺了得到玄宗宠幸、“鼻息干虹霓”的斗鸡小儿与富埒王侯的中贵;而“殷后乱天纪,楚怀亦已昏”(《古风五十九首》其五十一)是他得到的最终结论。玄宗既是个昏君,李白又受到谗毁,郁郁不得志,“乃浪迹纵酒,以自昏秽。咏歌之际,屡称东山。又与贺知章、崔宗之等自为八仙之游”(《草堂集序》)。这时的李白虽还以谢安自况,但已生无可奈何、不如归去之感,不得不借酒与仙为助。他看不惯朝中的腐败,又不能言;同流合污,又不甘心;身有傲骨,蔑视权贵,“手持一枝菊,调笑二千石”(《宣城九日闻崔四侍御与宇文太守游敬亭余时登响山不同此赏醉后寄崔侍御》其一),“天子呼来不上船”(杜甫《饮中八仙歌》),却又要保全自己,那么酒与仙确是全身远祸最好的法宝了。李白曾有诗说:“有身莫犯飞龙鳞,有手莫辨猛虎须。君看昔日汝南市,白头仙人隐玉壶。”(《对雪醉后赠王历阳》)话说得很沉痛,正因为他有切肤之感。他在朝中写的诗中已隐约表露出恶势力的摧残与谗言竞起是他萌生归意的主要原因:“风吹芳兰折,日没鸟雀喧。举手指飞鸿,此情难具论。”(《送裴十八图南归嵩山》其一)后来又多次提起:“一谈一笑失颜色,苍蝇贝锦喧谤声。曾参岂是杀人者,谗言三及慈母惊。”(《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并专门写下《雪谗诗赠友人》,足见他对以谗杀人的惧悸与愤恨。在险象环生、进退维谷之中,李白只得持“处世余龙蠖”(《金门答苏秀才》)的态度,就是要像尺蠖之屈与龙蛇之蛰一样求进取而不伤身。有鉴于“功成身不退,自古多愆尤”(《古风》其十八)的惨痛教训,想象“萧条两翅蓬蒿下,纵有鹰鹯奈尔何”(《野田黄雀行》)就可以避开危险,所以在此时期写的诗中常见这类句子:“予欲罗浮隐,犹怀明主恩。踌躇紫宫恋,孤负沧

洲言。终然无心云,海上同飞翻。相期乃不浅,幽桂有芳根。”(《同王昌龄送族弟襄归桂阳》其一)“功成谢人间,从此一投钓。”(《翰林读书言怀呈集贤诸学士》)正是他建功立业的希望被粉碎后的故作达观语。对于皇帝和宫廷,李白还有着深深的留恋,不肯轻易放弃这块已经得到的可以施展政治抱负的地盘;但朝廷中的腐朽势力又使他无能为力,他只好重新唱起隐逸、求仙的老调子来。同时,“功成身退”也是他一贯的思想,但“身退”是以“功成”为条件的,功不成则身不退,也是很显然的。李白一生都未成功,所以他也始终不能退身,而总是在寻找立功的机会。

如同李白始终把“岩崑广成子,倜傥鲁仲连”(《赠宣城宇文太守兼呈崔侍御》)引为同调一样,长安生活又使他格外亲近东方朔,不断在诗中写到他。西汉人东方朔在传说中是一个带有神话色彩的人物,他在许多方面与李白很相似。试作一个简单的对比:东方朔曾待诏金马门,李白则待诏翰林院;东方朔是长于为文的文学家,李白则是神于作诗的诗人;东方朔上书自求功名,成为好神仙的汉武帝近臣,李白则以交游干谒、求仙访道得到玄宗的召聘;东方朔生活在西汉最强盛的时期,以后汉朝便逐步衰落,李白则主要生活在“安史之乱”前,也正是唐代社会发展到最高峰开始走下坡路的时候;东方朔被人呼为“狂人”,李白也自言“我本楚狂人”(《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加上李白的字为“太白”(即金星),而东方朔相传为岁星(即木星)临凡,也使他容易产生浪漫的联想。所以他经常在诗歌中把自己比为“岁星”,他一步登天的特殊际遇使他觉得自己就像是天上的星宿直落在皇帝的身边,“谓我是方朔,人间落岁星。白衣千万乘,何事去天庭”(《留别西河刘少府》)。可惜皇帝是肉眼凡胎,没有看出他是天才,最后他只得被迫离朝,归天而去,让玄宗像汉武帝一样空自叹息吧。这样的比喻不仅自我排遣放归后的郁闷,而且还因为李白也看出了他们之间的相似处。东方朔尝自称是“避世于朝廷间者也”,并“据地歌曰:‘陆沉于俗,避世金马门。宫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庐之下。’”(《史记·滑稽列传》)无疑是一种愤世嫉俗之举。李白也称自己:“世人不识东方朔,大隐金门是谪仙。”(《玉壶吟》)同样有很深的感慨。利禄之徒、无能之辈塞满了朝中,世道翻覆,人心险恶,皇帝对臣下“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抗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则在深泉之下;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东方朔《答客难》)这一种状况,李白也有亲身感受。他曾衔悲而言:“惻惻泣路歧,哀哀悲素丝。路歧有南北,素丝易变移。”(《古风五十九首》其五十九)慨叹:“乐毅倘再生,

于今亦奔亡。”(《经乱离后……》)是将为虏也。又说:“圣朝久弃青云士,他日谁怜张长公?”(《单父东楼秋夜送族弟沈之秦》)是青云上入深泉下也。而以不能取容当世、故不再出仕的张挚(长公)自喻,正表明了他的退隐之不得已。因此,他在林下时是“小隐慕安石”(《秋夜独坐怀故山》),“起来为苍生”(《赠韦秘书子春》),在朝中时却又羡慕大隐宫中的东方朔,能够矫情违俗,反世道而行之。《汉书·东方朔传》载:“朔虽诙笑,然时观察颜色,直言切谏,上常用之。自公卿在位,朔皆敖弄,无所为屈。”李白也托名谪仙,“揄扬九重万乘主,谑浪赤墀青琐贤”(《玉壶吟》),沉醉殿上,皇帝不以无状怪之,这就是“虽与簪组狎,若与烟霞亲”(《对雪奉饯任城六父秩满归京》)的妙用了。他在诗中叙述自己的入朝时说:“岁星入汉年,方朔见明主。调笑当时人,中天谢云雨。”(《书怀赠南陵常赞府》)他们之间傲视权贵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这种“谑浪”、“调笑”的态度很了不起,它正是李白对东方朔产生特殊好感、引起共鸣的原因之一。苏轼也注意到李白与东方朔的这种一致性,在《李太白碑阴记》中,他引夏侯湛赞东方朔语“戏万乘若僚友,视俦列如草芥”以称美李白,是很有见地的。但李白与东方朔也有不同,从下例可清楚看出:东方朔曾谏阻汉武帝使董偃入内殿,当时“董君贵宠,天下莫不闻”,“见尊不名,称为‘主人翁’”,东方朔却奏陈董偃私侍窦太主有斩罪三;而李白在《古风五十九首》其八中也以董偃作比:“绿帟谁家子,卖珠轻薄儿。日暮醉酒归,白马骄且驰。意气人所仰,冶游方及时。”讽刺了当时朝廷中淫乱、污秽之行。两人所取态度相同,但表现方法及其效果却不一样。东方朔是大胆直言,除上例外,最有名的是谏汉武帝占民田以为上林苑有三不可,“绝陂池水泽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国家之用,下夺农桑之业”,“非所以强国富人也”。他甚至以殷纣王、楚灵王、秦始皇这些历史上的暴君、昏君为喻,极陈其危害。虽然东方朔常以诙谐为韬晦,这里可没有一丝一毫的玩笑口吻,是“忘生触死”而上言。尽管汉武帝没有采纳,东方朔的犯颜极谏也很可贵。李白则主要采取借诗讽喻的手法,玄宗可能根本不会知道这些诗,所以其政治作用是很有局限的。这固然由于李白所处的时代条件已与东方朔时不同,但他在政治上的作为和与恶势力抗争的精神的确不如东方朔。从这种比较中也可看出,李白的纵酒、爱仙除有对现实不满的反抗性外,也有消极逃避的软弱性。

“珠玉买歌笑,糟糠养贤才。方知黄鹤举,千里独徘徊。”(《古风五十九首》其十五)在朝中腐朽势力的排挤下,李白终于由玄宗赐金放还了。李白在诗中形容

这一段的情况是：“骑虎不敢下，攀龙忽堕天。还家守清真，孤洁励秋蝉。”（《留别广陵诸公》）由道隐入朝，又由在朝归入道隐，这就是李白走过的路。李白很高傲，不愿承认放还是他从政的失败，反而常常借用汉光武帝与传说为“客星”的严子陵的故事，高自称许。这时他的身份就由天庭中的岁星一变而为帝座边的客星了，以表示天子有所不臣。在《送岑徵君归鸣皋山》一诗中说：“光武有天下，严陵为故人。虽登洛阳殿，不屈巢由身。余亦谢明主，今称偃蹇臣。”在另一首诗中又说：“严陵不从万乘游，归卧空山钓碧流。自是客星辞帝坐，元非太白醉扬州。”（《酬崔侍御》）尽管说得很轻松，我们仍看得出这些话不过是聊以自慰罢了，实在是没有办法的办法。经过这样大的翻覆，李白对玄宗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徒希客星隐，弱植不足援。”（《书情赠蔡舍人雄》）他要隐身而去了，因为玄宗是位扶不起来的天子，不值得为其辅弼了。实际上李白对于再次隐逸很不甘心，这也正是他与严子陵不同处。严子陵冥处林下，无意问世，他的隐是一贯的、主动的；而李白则是身在朝中，有意用世，他的隐是暂时的、被迫的。他曾愤慨地指出：“世道日交丧，浇风散淳源。不采芳桂枝，反栖恶木根。所以桃李树，吐花竟不言。大运有兴没，群动争飞奔。归来广成子，去入无穷门。”（《古风五十九首》其二十五）正是因为世道黑暗已极，是非颠倒，忠奸不辨，所以才使抱着“当结九万期，中途莫先退”（《赠从弟宣州长史昭》）主张的李白只得走入迷茫的神仙世界。他在描写这段生活时用过这样的句子：“时命乃大谬，弃之海上行。”（《经乱离后……》）前句诗来自《庄子·缮性》篇：“古之所谓隐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见也，非闭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发也，时命大谬也。”可见李白的退入山林与仙境，有难言之痛，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他说过：“我本不弃世，世人自弃我。”（《送蔡山人》）李白是热爱人生、欲有为于天下的，但不见用于世，被迫藏身出世，正是令人为之掩卷叹息的。这次打击对李白来说是很沉重的，他也确实消沉了一段时期，与醉酒一样，他更多地借助求仙麻醉自己，寄托像“白发三千丈”（《秋浦歌》其十五）一样长的愁思。在此期间，他“请北海高天师授道箓于齐州紫极宫”（《草堂集序》），并有《奉饯高尊师如贵道士传道箓毕归北海》、《访道安陵遇盖寰为予造真箓临别留赠》二诗记此事，足见他沉迷之深。造成这种情况有社会原因，使我们对李白的不容于世产生同情；但也有李白自身的原因，在他身上同样反映出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的弱点。

这种消极的寄托有何效用呢？但看李白“每思欲遐登蓬莱，极目四海，手弄白日，顶摩青穹，挥斥幽愤，不可得也”（《暮春江夏送张祖监丞之东都序》），便可知幽

愤是不可借求仙消除尽的,正与“举杯消愁愁更愁”(《宣城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一样。李白毕竟不死心于立功,从他踏上归隐之路的第一天起,就在《还山留别金门知己》(又名《东武吟》)一诗中称自己:“长才犹可倚,不惭世上雄。……书此谢知己,扁舟寻钓翁(又作“吾寻黄、绮翁”)。”他要寻与为友的是以高龄之年出佐君王的姜子牙与商山四皓,可见他还在等待时机,以便“风云感会起屠钓,大人峴岵当安之”(《梁甫吟》)。虽然已到了“记得长安还欲笑,不知何处是西天”(《陪族叔刑部侍郎晔及中书贾舍人至游洞庭》其三)的困境,李白却仍然不改初衷:“遥望长安日,不见长安人。长安宫阙九天上,此地曾经为近臣。一朝复一朝,发白心不改。”(《单父东楼秋夜送族弟沈之秦》)希望有信陵君这样的贤臣发现、提携自己:“倘其公子重回顾,何必侯嬴长抱关。”(《走笔赠独孤驸马》)表示自己:“迹谢云台阁,心随天马辕。”(《书情赠蔡舍人雄》)“希君一剪拂,犹可骋中衢。”(《赠崔谔议》)这位以大鹏自负的大诗人此时尽管已是“无风难破浪,失计长江边”(《赠宣城宇文太守兼呈崔侍御》),却还不失雄心、不改故态,与人诗曰:“愿借羲和景,为人照覆盆。溟海不震荡,何由纵鹏鲲。所期要津日,倜傥假腾骞。”(《赠宣城赵太守悦》)就是希望在天下动荡的危急之秋,能够从覆盆之下解脱而去,直上九天,为国效力,因此他才有从永王璘与临死前一年的参加李光弼东征之举。虽然李白始终不是、也不可能成为一个政治家,但他这种昂扬的政治热情还是很感人的。李白既然还怀有这样远大的理想,他当然不会“归耕汶水滨”,他认为那种地方是留给“间以经济策,茫如坠烟雾”(《嘲鲁儒》)的腐儒们的。李白一直抱着“遁则以俯视巢、由”(《冬夜于随州紫阳先生馥霞楼送烟子元演隐仙城山序》)的宗旨,就是不肯默默无闻,沉沦到底。他曾愤慨于被斥后的冷遇,翘盼皇帝的再次启用:“宝刀隐玉匣,锈涩空莓苔。遂令世上愚,轻我土与灰。一朝攀龙去,鼉鼉安在哉。”(《酬张卿夜宿南陵见赠》)其中固然有为个人雪耻的打算,但更主要的还是为了实现其政治抱负。甚至在经过了长流夜郎这样沉重的打击,使得“平生不下泪”的李白亦“于此泣无穷”(《江夏别宋之悌》)后,他在赦书一到又立刻表示:“暖气变寒谷,炎烟生死灰。君登凤池去,勿弃贾生才。”(《经乱离后……》)很有股百折不挠的劲头。每当境况稍有好转,或国家处在用人之时,李白的从政心情便转为急迫,这在他的诗中有明显的表露。为此,他还要依靠求仙访道,继续交游干谒,以重新获得成功成名的机会。

李白开始了“五岳寻仙不辞远”(《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的漫游,又怕世人